

贵州方志中有关“穿青人”及其 先民族源和族称的记载

李良品

(长江师范学院 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重庆 408100)

摘要: 历代贵州方志中对“穿青人”及先民(土人、里民子)的族源、族称多有记述。通过分析,有几点值得厘清:第一,“土人”与土家族先民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第二,“土人”是一个多民族人们共同体;第三,“土人”与“里民子”并非一脉相承;第四,“穿青人”先民的主体是“里民子”。厘清“穿青人”及先民的族源和族称等相关问题,有利于专家学者对“穿青人”有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贵州方志; 土人; 里民子; 穿青人; 族源; 族称

中图分类号: K280.1.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2011)02-0159-08

On the Records of “ChuanQingRen” and the National Origins and Ethnic Appellations of Ancestors in Guizhou Chorography

LI Liang-pin

(Research Center for Wu Jiang River's Society Economy and Culture,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records on the “ChuanQingRen” and the national origins and ethnic appellations of ancestors (Natives and Liminzi) in Guizhou chorography for dynasties. Through analyzing, several points are worth of clarifying as follows: the first, “the Natives” have the deep original relations with the Tujia nation's ancestors; the second, “the Natives” is a community of multi-ethnic people; the third, “the Natives” and “Liminzi” aren't the same Lineage; the fourth, the subjects of “ChuanQingRen” ancestors are “Liminzi”. Clarifying related problems on “ChuanQingRen” and the national origins and ethnic appellations of ancestors, which is useful for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further study on “ChuanQingRen”.

Keywords: Guizhou chorography, Native, Liminzi, ChuanQingRen, National origin, Ethnic appellation

据2000年人口统计,贵州省西北部的“穿青人”计约67万。其中,毕节地区约54万人,安顺市约8万人,六盘水市约2万人,其它地区共约3万人。织金和纳雍两县穿青人最多,均超过20万人。穿青人作为中国尚未正式认定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人们共同体,目前学界对其族源和族称鲜有涉及,研究者仅有杨然、陈宏枢、王景才等数位。至今贵州穿青人及其先民族源和族称的学术探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本文基于历史文献的分析及田野调查的认识,试图从历史文献学和民族文化学的角度对这一人们共

收稿日期: 2011-02-18

[作者] 李良品(1957-),重庆石柱人,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同体的族源、族称及相关问题做一些肤浅的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贵州方志中族源的记载

穿青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部分成员。贵州方志记载和学界共识,穿青人是由“土人——里民子”发展而来。明清、民国及当今贵州方志对穿青人及先民的族源多有记载。

(一) “土人”族源

贵州方志对穿青人先民“土人”的来源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1. 思、播流裔说。《万历黔记》、《光绪水城厅采访册》和《宣统贵州地理志》对“土人”的记载均有“在施秉县者,多思、播流裔”^{[1] (P409)}、“土俗:思、播流裔”^{[2] (P293)}或“土人……在施秉者,多思州、播州宣慰司流裔”^{[3] (P518)}之说。《康熙黔书》“苗俗”同样有“土人……在黎平府曹滴司者,多思、播流裔”^{[4] (P480-481)}的记载。众所周知,思、播两州是唐代以来的建置,宋代三穗、镇远一带的邛水县,属思州安抚司管辖。今贵州黎平、锦屏、三穗、镇远、施秉等地元代时均隶属思州宣慰司。明朝初年,黄平等地隶属播州宣慰司。明初思州土司被裁革后,始置贵州布政使。贵州方志称“土人”为“思、播流裔”,说明土人是宋、元以来思、播土司所管辖的土民^{[5] (P40)}。明清以来居住在贵阳附近及以东属于“思、播流裔”的“土人”因“与军民通婚姻”、“渐染华风”、“改汉装”,或逐渐同化“已变汉矣”,或融入其他少数民族^{[6] (P21)}。笔者认为,明代及清前期的土人应为少数民族,贵州历代方志将其列为“蛮夷”、“苗蛮”、“土民”或“汉族同化者”就是佐证。

2. 宋家后裔说。所谓宋家,是水东土司宋氏统治下的人们,在较长时期内也曾被认为是“土人”。故道光《安平县志》有“一说土人,楚人也”的记载;民国《平坝县志·民生志》也有“土人即楚人之说。宋家系楚人,土人即专指宋家”、“宋家俗又呼为穿青,平邑此族尚多”一说。贵州历史上的水东宋氏土司,为明代贵州四大土司之一。因长期统治今鸭池河以东(今贵阳、修文、龙里、贵定等地区)而得名,由于其衙署长期在洪边寨(今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镇),故又名洪边宋氏。据传水东宋氏原籍镇州(今河北正定),隋代随军入黔。明初,宋钦与水西霭翠归附明朝,世袭贵州宣慰同知之职。有明一代,因水东宋氏叛服无常,明朝于崇祯四年(1631年)革除宋氏土司职,结束了宋氏对水东地区长达千余年的统治。宋氏土司治下的民众在汉政权的压力下也逐渐汉化^{[7] (P27-28)},部分人群进入水西腹地,成为今穿青人的先民。

3. 避难逃罪说。道光《安平县志》载:“一说土人,楚人也,元末从陈友谅反,及明太祖灭友谅,分兵剿其余党,反者皆逃入夷蛮中,以避诛戮。”^{[8] (P112)}民国《平坝县志》也载:“宋家……元末从陈友谅反,友谅灭,明分兵剿其余党,乃相率而逃之南中,以避诛戮。以其来自楚,故又呼此种人为楚人。是以宋家来自逃罪。惟平坝宋家确来自何年则不可考。”^{[10] (P67)}这说明在明初确有部分土人(包括宋家)或为“避难”而来,或是“逃罪”而至。

(二) 里民子族源

里民子的族源比较一致,即持“外省流寓”之说。道光《安平县志》载:“土人……一名里民子,衣尚青,妇人以银索盘头,与屯堡人无甚差异。”^{[9] (P112)}之后,咸丰《安顺府志》有“里民子,相传皆外省籍,其流离本末无考”^{[10] (P198)}等记载。其后,民国《清镇县志稿》和民国《朗岱县访册》也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趋同存异,大多传抄于道光《安平县志》。

(三) 穿青人族源

《毕节县志》载:“穿青人,旧志中少有记载,但民间称谓已久。”^{[11] (P155)}贵州在近二十年所修方志中,在介绍穿青人或论述民族识别问题时,大多有穿青人族源问题的叙述。《织金县志》载:“从汉文献记载穿青先民早期的活动地域及习俗看,其基本成分是骆越后裔俚僚即五溪蛮中的一部分发展而来。穿青人先民早期居地在五溪地区的西南部,即宋元时期思州所辖的镇远、施秉、

三穗和播州所辖的黄平一带。稍后有部分徙居龙里、贵定和贵阳周围，故史志称之为‘思、播流裔’。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取道贵州征云南，居于贵阳周围的穿青人先民被迫迁入水西的水外六日地即今清镇、平坝以西的鸭池河及三岔河东岸一带。继后，陆续迁入水西内地，发展为现今的穿青人。”^{[12] (P162)} 《大方县志》载：“穿青”也称“土人”，与古“俚人”有一定渊源，称“里民”，另有“穿青”、“羨民”、“民家”三称。本县穿青人来自清镇的排沙（今流长区沙鹅乡）和织金以那架^{[13] (P165)}。《平坝县志》载：穿青人，一说源于宋国，称“宋家”；一说为屯军之亲眷，与屯军先后至者，县内旧有“土人”、“里民子”、“县民”的称谓，以区别于屯军^{[14] (P108)}。《清镇县志》载：穿青人先民于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时到贵州。迁至清镇县境时，先住谷地里、谷上里、谷下里、排杉等地，后搬迁各地。因进贵州时打青旗、穿青衣而得名，历史资料上称“土人”、“旧人”、“里民子”、“宋家”等^{[15] (P860)}。《水城县志》说：穿青人族源众说不一，据民间家谱所记，属外来说。即祖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明洪武三年至七年（1370—1374年），朱元璋调北征南时，随军入黔。有的系经商而来，先到独山，经贵阳最后迁入今水城比德^{[16] (P208)}。《赫章县志》载：赫章的穿青人为清代以后从水城、纳雍迁入，自称“穿青”^{[17] (P118)}。《威宁县志》载：穿青人多数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从贵阳、大方、纳雍、黔西各县迁入威宁，迄今200多年^{[18] (P130)}。上述穿青人族源众说，或沿袭旧志，或略作修改，或源于家谱，或作文献考证及民间考察，《织金县志》的记载可采信。

二、贵州方志中族称的记载

数百年来，穿青先民及穿青人与贵州各族人民不断交往，历代地方史籍不绝于书。但由于朝代更迭、时局变化，加之穿青先民的迁徙，遂使穿青先民族称时有变异。这给史学家和民族学家深入研究穿青先民的历史造成了障碍。^[19]

据贵州有关方志记载，穿青人的族称早期叫“土人”，接下来叫“里民子”，后期叫“穿青”。^[20]《大方县志》又载：“穿青”也称“土人”。与古“俚人”有一定渊源，称“里民”。另有“穿青”、“羨民”、“民家”三称^{[13] (P165)}。在《清镇县志》、《赫章县志》、《织金县志》等方志对“穿青”的族称均有阐述。《平坝县志》解释“穿青人”说：“因衣饰喜青色，俗称‘穿青’。”^{[14] (P108)}笔者认为，“穿青人”族称当与其先民“衣尚青”有直接关联。

（一）土人

一般而言，“土人”即土著居民，这也是早期对南方土著少数民族的泛称。贵州方志称“土人”，是因为他们“居土日久”，是贵州的土著民族，这是以居住的历史状况来称呼的。随着民族的迁徙、融合，在一定范围内，“土人”一词逐渐演变成某一民族实体的专称。明清时期贵州方志所载的“土人”是专指一个少数民族集团^{[6] (P18)}。贵州“土人”这一称谓在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黔记》及清代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等史志中均有记载。

1. 明代贵州方志中关于“土人”的记载。贵州方志中最早记载“土人”的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该书在《思州府》“风俗”条载：“旧志土人每岁自正月元日为始，每晨汲后不许更汲，浣污秽其河，来者亦不许入其村落，有犯则以为不祥，群訾责之，如是忌者，凡一、二、七日始解。”^{[21] (P49)}同书《思南府》“风俗”条“采砂为业”有“土人以皮帽悬灯于额，入坑采砂”及“土人倚为生计”^{[21] (P54)}等记载；该书《铜仁府》“风俗”条有“土人稍知礼义”^{[21] (P82)}的记载。

嘉靖《贵州通志·风俗志》对“土人”是分区域记载，除思州府、思南府内容与《贵州图经新志》“风俗”条所载内容相近外，其它区域尤为详尽^{[22] (P269-270)}。

除涉及贵州省的三部方志外，嘉靖《思南府志》也有记载：“郡西北，若水德蛮夷、若务川、

若沿河，号曰土人，有土蛮，稍平易近俗而彼此亦不皆同。”^{[23] (P491)}

2. 清代方志中关于“土人”的记载。清代《嘉庆一统志》对“土人”有记载：“土人，在贵筑、贵定、广顺等处，与军民通婚姻，男子事贸易，妇人力耕作，岁时礼节，皆同中原。黎平府亦有之。”^{[24] (P36)}这是国家志书对土人的记述。

贵州省各地的方志对“土人”记述颇多，详略各异。道光《贵阳府志》与《康熙黔书》“苗俗”内容基本相同，更着重强调土人“今已变为汉人矣。”^{[26] (P1609)}道光《安平县志》载：“土人……一名里民子，衣尚青，妇人以银索盘头，与屯堡人无甚差异。妇女不缠足，男子娴贸易，耕作多妇人为之。称曰县民，以别于屯军也。岁时礼节，俱有楚风。”^{[8] (P112)}宣统《贵州地理志》载：“土人，所在多有在广顺、贵筑、贵定者，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具有华风。男子间贸易，妇人力耕作”。^[3]

从上述史料可见，“土人”一词在明清各级方志中累书不绝，清末以降，少有再用“土人”名称记载。明清时期贵州“土人”既与其他少数民族并举，说明至少在汉族封建知识分子的修史志者看来，“土人”已具备了自身的特点；但是他们的居地分散，风俗各异，显然并非属于同一个族体，而是一种泛称。杨然博士认为，“土人”是汉化的土司治下的比土司本身汉化程度低，却又比其他少数民族汉化程度高的土著，也即是史志中所谓的“熟苗”^{[7] (15-16)}。如果说明代贵州“土人”还是一个倾向于汉化但仍带有比较突出的少数民族特点的多个群体集团的泛称的话，那么，清代以降的贵州“土人”通过迁徙、交流，逐渐融合汉化，与汉族并无多大差异了。故道光《贵阳府志》直截说，“土人……今已变为汉人矣。”^{[26] (P1609)}

(二) 里民子

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贵州方志中，对“里民子”的记载不绝于书。乾隆《黔南识略·水城通判》始有“里民子”名称出现，并强调“男皆剃发，通汉语，颇知耕织。”^{[27] (P498)}

在清代中后期及民国时期方志中均记载了“里民子”的分布区域。嘉庆《黔记》载：“里民子，在贵阳、黔西、大定、清镇等处。”^[28]道光《大定府志》提到水城有里民子，“俱杂处境内诸寨。”^{[29] (P305-306)}宣统《贵州地理志》和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俱载：“里民子，在贵阳、黔西、大定、清镇等处”^{[3] (P519)}或“在清镇、大定、黔西。”^{[30] (P331)}“里民子”的分布区有三大特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都分布在原水西土司的领地内；二是他们有连片的聚集区；三是其分布区靠近交通线和大城镇。这表明“里民子”与彝族土司的关系十分密切。^{[31] (P266)}

贵州方志对“里民子”的经济生活方式、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和岁时礼节等记载颇为详细。嘉庆《黔记》载：“里民子……男子多贸易，妇女穿细耳草鞋，勤俭耕作，闲则纺毛布作衣，爱养牲畜，常带入山作活。每岁节与汉人同。”^[28]民国《清镇县志稿》载：“里民子……衣尚青、妇女不缠足，耕田。”^{[32] (P539)}民国《镇宁县志》载：“李民子，语言装束渐同汉族，惟妇女不缠足，以是知之。今则无甚差别。西乡果寨一带犹有李民子遗裔……他若水城、威宁之李民子，犹复短衣长裙，另有乡谈。”^{[33] (P593)}民国《郎岱县访稿》甚至还详细记述了“里民子”的居处：“理民子……西门外坝子上有，姑娘寨、金家寨、乌头寨、青杠林、勾家寨、卢家寨等处皆是。”^{[34] (P407)}

由上述文献记载可见，“里民子”这个名称，明代典籍未曾提及。有的专家学者从民族文化学角度分析认为：由于“里民子”的分布区域与贵州彝族水西土司的领地完全重合，他们进入汉文典籍又是在彝族土司覆灭后，足见他们是原彝族土司的荫庇户。与“宋家苗”和“蔡家苗”相比，他们的凝聚力不强，对土地的占有不稳定，受彝族荫庇的时间不早，其地位也不高。追述其根源在于：不管是在彝族或是汉人的眼光中，“里民子”的前身都不是一个定型的人群集团，而仅是彝族荫庇下的散户。李汉林先生还认为，“里民子”的前身很可能是明代军屯或民屯中因不堪严刑峻法、脱籍逃入彝族地区的汉族居民。由于他们是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不同目的的情况下分别进入彝族

地区的，因而他们不能形成定型的人群集团。这是明代及清前期贵州方志中没有“里民子”名称的根本原因。^{[31] (P314)}

(三) 穿青

“穿青”一词最早在光绪《平远州续志·地理志》中有“穿青夷民”的提法，这是清末官方对这一尚在形成中的人们共同体的称呼。所以称为“穿青”，是从“衣尚青”而得名，这是以其服色特点来称呼的。这种称呼先是他称，进而“穿青”之名被穿青人接受了，成了他们的自称。^[20]《民国大定县志》是在记述同治初年农民起义时提到的。该书《前事志》载：“（同治二年）苗匪袭据白泥屯，六月移据大兔场。……匪势益张，移扎水城之米乐。分苗民为大堂，竹（祝）万春、何玉堂为堂官；夷民为二堂，何五斤为堂官；仲家、穿青为三堂。以先生为尊称，以寺观为殿宇。堂官各率所属战守掠，食尽则他往。”^{[35] (P89)} 民国《镇宁县志·民风志·民族》第四种记述了“穿青，喜著青布，其先与汉族不同，今则无异，惟妇女不缠足、著大花鞋、腰带头垂须一簇。此族又与凤头籍异（凤头籍或作风头鸡）”^{[33] (P593)} 等内容，并将“穿青”与“李民子”、“屯堡人”并举为另一族群，笔者认为，结合史志及“民间称谓已久”的实际，“穿青”这个名称应该在清代中期就已诞生。

总之，贵州方志对穿青人的称呼，有官称和俗称两种。官称是以来历或身份命名，俗称是以服色命名。官称有“里民子”等称呼；俗称有“穿青夷民”、“穿青”等称呼。无论是官称还是俗称，不同的名称所记述的内容都是反映穿青人的历史、社会身份、经济方式和风俗习惯。

三、贵州方志中“土人”、“里民子”及“穿青人”记载的相关问题

早期“穿青人”先民从贵州以东诸省迁入，这在贵州部分方志有一定记载，是比较可信的。笔者对穿青人是由“土人”、“里民子”发展而来的观点不敢苟同。因为土人与里民子在分布区域、经济方式、语言、服饰、风俗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详见下表。

土人与里民子比较一览表

比较类别	土 人	里 民 子
族群来源	思播流裔；历代遗民；杨黄之属	外省流寓
分布区域	明代：邛水司、省溪司、铜仁司、乌罗司、方番司、黎平曹滴洞司	明代：不详
	清代：邛水司、黎平曹滴洞司、施秉、广顺、贵筑、贵定	清代：贵阳、黔西、大定、清镇
经济方式	男子间贸易，妇人力耕作；采砂；勤于耕作	男子多贸易，力农，耕田
语 言	语言莫晓；言语各异	语言“渐同汉族”
服 饰	非夷非汉衣装束；服饰近汉人；已变汉装；妇女顶插大簪，腰拖长带	衣尚青；妇女不缠足；穿细耳草鞋或大花鞋；闲则纺毛布作衣；短衣长裙
一般习俗	性丑陋，好斗战；出入不离刀弩；吹匏笙；种植时田歌相答；杀牛祭祖；岁首则迎山魃，逐村屯以为雉，击鼓以唱神歌；祀五显神	爱养牲畜；岁时礼节绰有楚风，正月击鼓以唱神歌；间有习诗书者
婚姻习惯	与军民通婚姻；婚丧之礼与汉人无甚差异	婚丧之礼与汉人无甚差异
丧葬习俗	葬以鸡卵卜地，掷卵不破者云吉地；送死杀牛祭鬼，束薪而葬	不详
岁时礼节	岁时礼节皆同中原	每岁节与汉人同

（注：笔者根据《贵州通志·土民志六》及贵州其它相关方志整理而成。）

根据上表及贵州相关方志,笔者认为,下列问题有必要厘清。

(一) “土人”与土家族先民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

明代和清代前期贵州土人和土家族先民居同地、族同源(思播流裔)、生活习俗相同、宗教信仰一致。笔者以为,“土人”与土家族先民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

第一,从分布区域看,土人和土家族先民共居一地。明代嘉靖《贵州通志·风俗志》中提到的“土人”,除黎平府曹滴洞司土人外,其邛水司(今贵州印江)、铜仁司(今铜仁)、省溪司(今江口)、乌罗司(今松桃)均在今土家族聚居区。施秉及黎平府曹滴洞司的土人“多思、播流裔”,其实这部分土人也有部分是早期的土家族。不可否认的是,清代之后西迁至贵阳、贵筑、贵定、广顺等地的土人已基本汉化,融入了汉族或其他民族。

第二,从生活习俗看,土人和土家族先民如出一辙。“土人”在艰苦的田间劳作过程中,种田人以田间对歌的形式,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正所谓“种植时,田歌相答,清越可听”^{[4] (P480)}。“田歌相答”是土家族耕作时的特有习俗。因此,笔者认为,土人的“田歌相答”与明代思南府蛮僚“唱歌耕种”^{[21] (P54)}及土家族先民的“薅草锣鼓歌”、“摆手歌”基本相同。而土人“哀怨殊可听”的歌曲与土家族的“哭嫁歌”和“丧鼓歌”比较吻合。

第三,从宗教信仰看,土人和土家族先民基本一致。至今土家族地区的主要宗教祭典为“雉祭”,这是一种接近戏曲,可以表演的宗教仪轨,表演者除了唱念台词外,还需要执道具进行舞蹈表演,这种“雉戏”表演至今在黔东南及黔东北地区十分盛行,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而贵州方志所载土人“击鼓以唱神歌”、“居宅皆供有坛神”^{[2] (P293)}等与土家族先民的宗教信仰别无二致。

也正是基于此,杨庭硕先生在《百苗图抄本汇编》中得出“土人是专事商贸活动的土家族”^{[6] (P191)}的论断。

(二) “土人”是一个多民族人们共同体

明清贵州方志把“土人”归为“夷属”、“苗属”,“通谓之苗蛮”等,说明“土人”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20]。明及清前期,土人居住在邛水司、省溪司、铜仁司、乌罗司、方番司、黎平曹滴洞司及施秉、广顺、贵筑、贵定等地,并且呈逐渐西迁的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贵州方志中记载的土人是以土家族先民为主体并融合了其他民族而形成的多民族人们共同体。其风俗习惯具有民族文化多样性:

明代思南府土人“采砂为业”,铜仁司土人“祭祀用鱼为牲,葬置棺,俗重山鬼”^{[22] (P269)},清代广顺、贵筑、贵定的土人“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俱有华风”^{[3] (P518)}、“种植时,田歌相答”^{[15] (P481)}及水城厅土人“逐村屯以为雉”、跳“庆坛”戏^{[2] (P293)},这与黔东南土家族的风俗习惯相似。

明清时期施秉县土人“吹匏笙,连袂宛转,顿足歌舞,至暮而还”^{[25] (P22)},这种习俗应视为苗俗,因为匏笙(即芦笙)是苗族文化的标志;黎平府曹滴洞司土人“葬以鸡卵卜地,掷卵不破者曰吉地,葬之”^{[22] (P270)},这是十分明显的苗俗。

黎平府曹滴洞司土人“出则男负竹笼,妇携壶浆同行”^{[22] (270)},则是较强的侗俗。

但从清朝中后期土人“服饰近汉人”、“已变汉装”,“婚丧之礼与汉人无甚差异”及“岁时礼节皆同中原”的情况看,土人在乾隆年间后已成为一个汉化程度较高的人们共同体。

(三) 土人与里民子并非一脉相承

李汉林先生在《百苗图校释》书中说,黔中地区的各民族,在明、清两代,其称谓自成系统。汉移民一般称为“宋家”或“蔡家”,苗族称为“苗”或“苗蛮”,布依族称为“番民”或“仲家”,土家族则直接称为“土人”,以便将他们与“宋家”或“蔡家”区别开来,而不至于将他们误为汉族移民^{[1] (P290-291)}。此话很有道理。只要翻检涉及贵州全省的方志或《道光贵阳府志》,没有哪一部方志不是将土

人与里民子分别叙述。因此，土人与里民子是两个不同的人群集团。从族源上看，他们并非一脉相承。当然，在穿青人先民中，不排除有土人的融入，但主体应是里民子而不是土人。

明代及清前期贵州方志中的土人，主要指黔东及黔东北的土家族先民；清代中后期及民国贵州方志中所说的“土人”，主要是指散居在黔中地区的土家族先民，但所载内容也包涵了黔东北土家族先民的基本状况。杨庭硕先生认为，元代以前，贵阳地区仅有零星的土家族散居，元廷为了抑制水东、水西两大地方势力的膨胀，有意识地扶植土家族思州土司和布依族小土司，以此削弱彝族土司的势力。因而，不少土家族迁入贵阳地区定居，直到明朝中期，这样迁入的土家族成员一直是地方势力直接控制的居民。“土人与汉族通婚姻，正是各代王朝扶植土家族地方势力的结果。这批土家族在改土归流后，逐渐同化于汉族”^{[37] (P191)}。李德龙结合黔东和黔中的实际，在《黔南苗蛮图说》中认为，“土人”应指土家族，因为与当今土家族在贵州的居住地相吻合^{[38] (P89)}。

清代中后期和民国时期贵州方志中出现的“里民子”，是指已经编为里的一批特殊的新纳税户，这与清政府在改土归流之后推行里甲制度有关^{[32] (P266)}。杨庭硕先生认为，所谓“里民”，就是编入甲里的居民。称他们为“子”，是因为他们原先是彝族土司的荫庇户，在清代人的眼中仍然被视为少数民族的原因^{[37] (P463)}。从语言和习俗看，“里民子”的族属实为汉族^{[38] (P90)}。其实，“里民子”和“土人”一样，也是一个人们共同体，各地“里民子”的风俗不尽相同。

(四) 穿青人先民的主体是里民子

云南大学尤中先生1983年回复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的信函说：里民子中吸收了不少外来汉族人口；里民子的核心部分当为布依族，他们更多地吸收了汉族人口和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39] (P129)}。笔者考察分析，穿青人主要聚居区处于乌江上游的六冲河、三岔河和鸭池河三条河流域。其北面主要是彝族，南面主要是屯堡人，再结合嘉庆《黔记》、道光《大定府志》、光绪《安南县乡土志》、宣统《贵州地理志》、民国《贵州通志》、民国《清镇县志稿》、民国《镇宁县志》、民国《郎岱县访稿》等方志记载的里民子及近二十年编纂的《织金县志》、《大方县志》、《平坝县志》等方志记载的穿青人的相关内容，笔者认为，里民子和穿青人在居住区域、经济方式、语言服饰、风俗习俗等方面情况基本相同，当今黔西北穿青人先民的主体是清代编入甲里的居民——里民子，而并非是调北征南的屯军亲眷。

参考文献：

- [1] (明) 郭子章. 万历黔记[M]. 贵州府县志辑(卷3) [Z]. 成都：巴蜀书社，2006.
- [2] (清) 陈昌言. 光绪水城厅采访册[M]. 贵州府县志辑(卷15) [Z]. 成都：巴蜀书社，2006.
- [3] (清) 佚名. 贵州地理志[M]. 贵州府县志辑(卷1) [Z]. 成都：巴蜀书社，2006.
- [4] (清) 田雯. 康熙黔书(上) [M]. 贵州府县志辑(卷3) [Z]. 成都：巴蜀书社，2006.
- [5] 王景才. “穿青”的历史地位[A]. 纳雍文史资料(第3辑) [C]. 纳雍：政协纳雍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
- [6] 陈宏枢. 穿青人历史与文化[M]. 织金：织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3.
- [7] 杨然. 穿青人问题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2006.
- [8] (清) 刘祖宪. 道光安平县志[M]. 贵州府县志辑(卷44) [Z]. 成都：巴蜀书社，2006.
- [9] 江钟岷. 民国平坝县志[M]. 贵州府县志辑(卷45) [Z]. 成都：巴蜀书社，2006.
- [10] (清) 常恩. 咸丰安顺府志[M]. 贵州府县志辑(卷41) [Z]. 成都：巴蜀书社，2006.
- [11] 贵州省毕节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毕节县志[Z].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 [12] 贵州省织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织金县志[Z].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 [13] 贵州省大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大方县志[Z].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7.
- [14] 贵州省平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平坝县志[Z].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 [15] 贵州省清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清镇县志[Z].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 [16] 贵州省水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水城县志[Z].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 [17] 贵州省赫章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赫章县志[Z].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 [18]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Z].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 [19] 田晓岫. 藏族族称考[J]. 民族研究, 1997, (3).
- [20] 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穿青识别组. 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问题的重新调查报告[Z]. 1986, (3).
- [21] (明) 沈 庠.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Z]. 贵州府县志辑 (卷1)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 [22] (明) 谢东山. 嘉靖贵州通志[Z]. 贵州府县志辑 (卷1)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 [23] (明) 洪 价. 嘉靖思南府志[Z]. 贵州府县志辑 (卷43)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 [24] 嘉庆重修一统志 (第29册). 贵州府 [Z]. 清嘉庆刻本.
- [25] (清) 鄂尔泰. 乾隆贵州通志. 苗蛮志[Z]. 清乾隆六年 (1741) 刻本、嘉庆修补本.
- [26] (清) 周作楫. 道光贵阳府志 (校注本) [Z].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 [27] (清) 爱必达. 黔南识略[M]. 贵州府县志辑 (卷5)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 [28] (清) 李宗昉. 嘉庆黔记 (卷三) [M]. 道光十四年 (1834) 刻本.
- [29] (清) 黄宅中. 道光大定府志 (点校本) [M]. 中华书局, 2000.
- [30] 刘显世. 民国贵州通志[M]. 贵州府县志辑 (卷11)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 [31] 李汉林. 百苗图校释[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1.
- [32] 方 中. 民国清镇县志稿[M]. 贵州府县志辑 (卷36)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 [33] 饶燮乾. 民国镇宁县志[M]. 贵州府县志辑 (卷44)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 [34] 葛咏谷. 民国郎岱县访稿[M]. 贵州府县志辑 (卷15)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 [35] 李 芳. 民国大定县志 (点校本) [M]. 贵州省大方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5.
- [36] 杨庭硕. 百苗图抄本汇编[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 [37] 李德龙. 黔南苗蛮图说[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 [38] 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志[Z].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夏 林)

(责任校对: 冷 非)